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辛亥百年变局

由章可的《人马图》说起

终身义工

风暴初起时

文化繁荣何处寻

怪异的作家和独特的笔法

黄万里和张光斗的「决斗」

朱镕基怒批《中国农民调查》

林彪专机坠毁细节

从解密档案看朝鲜战争

# M 悦 读 K

第二十四卷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4

# M 悦 读 K

第二十四卷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二十四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91-5853-2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4145号

**悦 读MOOK (第二十四卷)**

---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853-2

**定 价** 2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卷首语

这一卷《悦读》问世之时，正是一百年前起义新军在武昌城打响第一枪的纪念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的辛亥革命，一举起义成功，推翻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近三千年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帝制，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遗憾的是，我们不少同胞或是遗忘了这场革命，或是知之甚少。在组织本卷稿件时，我们曾征求一些读者的意见。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已步入不惑或知命之年的中年人。当问及是不是知道辛亥革命？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太清楚”，或者漠然摇头。一百年并不算遥远，可是这场攸关中国命运的革命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其实，说来也不奇怪，这些年，类似的事并不罕见。别说一百年前发生的事，就是二十、三十年前的近事，也被淡忘了。细究起来，而今社会营造的气氛，使不少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关心的就是明星、时尚、品牌和八卦新闻。有的在KTV中，能准确背唱出几十上百首流行歌曲，但就是不清楚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张謇、黎元洪……是何许人，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当然，社会特别是教育难辞其咎，而史学研究工作者也是有责任的。辛亥革命发生一百年了，翻阅近几十年有关的出版物，对于这场革命及其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近些年才注意还其真面目；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也逐渐回归真相；可是有关的教科书离历史的真实还有相当距离……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努力。须知辛亥革命是一场改变中国三千年命运的大革命，带给中华民族的震荡，至今尚未结束。

在这一卷中，我们刊发了几篇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章，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供读者们参阅。

##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辛亥百年变局	傅国涌 / 005
	血钟英响 志士悲歌	林东海 宋 红 / 018
	清遗老与辛亥革命	周 帅 / 028
人 物	由章可的《人马图》说起	陈万雄 / 037
	终身义工	陈四益 / 044
	风暴初起时	
	——“文革”中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范玮丽 / 049
	傅斯年之死	范 泓 / 056
议论纷纷	这不仅仅是“应试”问题	虞非子 / 064
往 事	鸿爪掠影(三)(之四)	王学泰 / 067
悦读一得	一个有担当的批评家	
	——读李建军的《文学因何而伟大》	辛泊平 / 078
	电视塔政治	张穗华 / 081
	沙哈尔是他国的于丹	丁国强 / 086
书与插图	永无安宁之灵	汪家明 / 089

艺苑杂谈

《浪潮》的现实意义

彭小莲 / 095

域外风

文化繁荣何处寻

萧文泉 / 098

怪异的作家和独特的笔法

——澳大利亚作家怀特素描

黄源深 / 103

《沉重的黄沙》面世记 [俄]阿·雷巴科夫 马海甸译 / 112

不死的俄国

顾文豪 / 120

“老照片”札记

蔚为大观的“家国合影”

冯克力 / 124

海外书情

基因不是万能的——直面世界，直面人生——慧眼识深意——最早的现代战争——美国外交思想的智者——见证中美外交——为了印度，为了全人类——苦难的记载

/ 129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一个水利会议惊动八个常委——无法令人高兴的 GDP 增长——近七成有罪贪官免受刑罚——当前社会说谎之风日渐泛滥——中、小学校校长正成为一项高危职业——不可思议的高尔夫球场

/ 137

► 人物志 ◀

- 黄万里与张光斗的“决斗” 李志伟 / 140  
朱镕基怒批《中国农民调查》 张远方 / 147  
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胡治安 / 150  
黄维谈往事 王春景 / 154  
末代皇帝的最后归宿 张觉民 / 159

► 历史往事 ◀

- 林彪专机坠毁细节 舒云 / 161  
从解密档案看朝鲜战争 郭田珍 郝建业 / 169  
护送毛泽东 任远 / 175

► 国情点滴 ◀

- 中国的净债权有多少 孙文凯 / 178  
中国产品的质量风波 周文重 / 182  
香港的公车 尹世昌 / 186

► 四面八方 ◀

- 苏联如何走向亡国亡党 黄玮町 / 188  
拉萨的关帝庙 崔士鑫 / 194  
温州人是怎么赚钱的 肖莹 / 198  
离奇的巧合 北巫 / 202

# 辛亥百年变局

◎傅国涌

如今我们聚在一起，一般都是在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谁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

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所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一六〇〇年，终点放在二〇〇〇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但是我当初看到的只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只翻译到一九一一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不久前，我们





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军

在武汉开了一个“百年辛亥——变与不变”的研讨会。“变”与“不变”被作为百年辛亥的中心词。其实我个人对“变与不变”一直有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二〇一〇年二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一百二十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七十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像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

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

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二〇〇四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百分之十二,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

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很遗憾,人们几乎只能跟两千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一九〇九年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给农民剪掉象征清王朝统治的辫子。

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一九〇五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一九〇六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

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拿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一九〇八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

年,英国从一二一五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六百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我们目前见到的海峡两岸撰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够完整的,因为它主要只说出了各自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级、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

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三十六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两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

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

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



1911年11月14日，英国一家报刊关于中国辛亥革命中一些城市镇压革命的报道，标题为“这样的惩罚会降临到被捕的革命者身上”。其中报道一些城市的革命者遭到镇压的情况。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通电独立，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会兵不刃血地完成革命，很多革命者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图为城门上悬挂示众的革命者头颅。

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間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一百二十天当中,中国发

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



1911年，孙中山戎装肖像。

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

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取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目标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

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一八六〇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党国,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有些东西可以充分

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首先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一九〇二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一九〇五年废除的。但是一九〇二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一九〇四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印书馆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国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党、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



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一九二二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一九二二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一九〇四年到一九四〇年代这近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

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一九五〇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



1911年,孙中山夫妇与北伐军军官合影。